

## 香港政治傳播研究的軌跡與前景

徐來、黃煜

### 摘要

香港政治傳播研究具有自身獨特性與學術挑戰性。自上世紀八十年代發展至今，大體可劃分為三個時期：起步期、發展期與蓬勃期。本文圍繞每一時期香港政治傳播研究相關論著的內容進行「歷時性」的梳理分析，發現香港政治傳播研究始終與「新聞自由」、「權力重組」、「建構現實」等研究主題相聯繫，並伴隨香港社會政治情境的變遷，不斷湧現出新的研究重點與課題，近年的研究則圍繞社交媒體與政治參與及新社會運動展開。在研究中，香港政治傳播學界發出頗具操作性的中層概念或理論，如「傳媒的代議功能」、「非組織性集中化」、「文化共向」、「強化客觀性」、「迷糊策略」、「民意激蕩」、「新聞範式的更迭」等，這些概念或理論的提出，為建構更高層次的傳媒與政治互動模式提供了理念和實證的根據。鑒於政治傳播研究本身的開放性，方興未艾的香港政治傳播研究理應向著更多向度的研究角度邁進，在嶄新的媒體時代追尋更為深遠的學術價值與意義。

關鍵詞：香港、政治傳播研究

徐來，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興趣：政治傳播學、修辭學。

電郵：rebecca.xulai@gmail.com

黃煜，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教授。研究興趣：新聞與媒體表現、傳播政治經濟學。電郵：s03033@hkbu.edu.hk

論文投稿日期：2015年5月19日。論文接受日期：2015年12月7日。

## **The Track and the Prospect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Hong Kong**

Lai XU, Yu HUANG

---

### **Abstract**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Hong Kong is unique and academically challenging because of the uniqueness of Hong Kong's political ecology.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re than thirty years, the research can be divided by the Return of Hong Kong in 1997, the landmark event, into three periods—infancy, development, and the flourishing stage—each with different research focus and characteristics. The authors analyze the contents of Hong Ko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apers from the 1980s to 2014, and find out that they have been focusing on the topics of “freedom of the press,” “power restructur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nd also derived new research topics from the social changes in Hong Kong, examining the “public opin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representatives and social movements, news reports and Hong Kong's local awareness/interest, and so on. Recent researches are more related to social media, civic participation, and new social movements. Meanwhile, the opennes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has contributed to a more encouraging atmosphere for Hong Ko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ers to explore at this stage, such as applying different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to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expanding the research sphere, updating the

---

Lai XU (PhD Student).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hetoric.

Yu HUANG (Professor).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media performanc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The Track and the Prospect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Hong Kong*

research objects, and promoting research at much more extensive and deeper levels, with a view to achieve a greater and more profound academic significance in the new media age in Hong Kong.

**Keywords:** Hong Ko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Xu, L., & Huang, Y. (2016). The track and the prospect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Hong Kong. *Communication & Society*, 36, 133–162.

## 引言

作為亞太區的資訊中心之一，香港傳媒業的發達令人稱奇。彈丸之地卻座擁百花齊放的傳媒實體，<sup>1</sup>是亞洲新聞最開放的地區之一。<sup>2</sup>由於大眾傳媒在香港的政治發展進程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不僅充分反映出香港社會政治變遷、權力轉型過程中的具體特點，也反向影響著本土政治生態，形成獨具特色的政治傳播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現象。近三十年來，以香港傳播學者為主的研究者們對香港政治傳播現象進行了不懈的探索，發表了一批值得關注的論著。隨著香港九七回歸以來香港政治社會的急劇變遷，香港政治傳播愈加成為學者關注和考察的熱點課題。

本文以「歷時性」的分析視角，回顧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至今研究學者們關於香港政治傳播的主要論著，以九七香港回歸為界，將研究階段大致劃分為三個時期：起步期、發展期與蓬勃期。由於自政治傳播研究在香港紮根伊始，便有一群與國際學界保持緊密對話的較為活躍的香港傳播研究學者，注重實證研究，並在研究時借用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相關理論，衍發出頗具操作性的中層概念或理論，如「傳媒的代議功能」、「非組織性集中化」、「文化共向」、「強化客觀性」、「迷糊策略」、「民意激蕩」、「新聞範式的更迭」等。這些概念或理論的提出，為建構更高層次的傳媒與政治互動模式提供了理念和實證的根據(陳韜文、黃煜、馬傑偉、肖小穗、馮應謙，2007)，也體現出香港政治傳播研究的時代性特徵，但總體而言，儘管伴隨香港社會政治情境的變遷，不同階段湧現出不同研究重點，然而，長期來看香港政治傳播研究卻始終與「新聞自由」、「權力重組」、「現實建構」等主題聯繫在一起，反映出香港社會政治傳播關注的熱點一直持續至今。

如今，香港政治傳播研究已延續三十餘年，與香港政治生態及市民社會發展息息相關，發展勢頭方興未艾，回顧、梳理與審視這一研究領域，既填補相關學術回顧的闕漏，又具有重要的階段性意義。因此，本文將圍繞香港社會政治變遷的背景與特點，從以下四個方面對過往研究文獻進行述評：一、何謂政治傳播研究；二、香港政治傳播

研究的社會政治背景；三、香港政治傳播研究的階段性歷程，以及不同階段的研究內容、主題及特點；四、香港政治傳播研究的前景展望。通過歸納和梳理不同研究階段的代表性觀點與發現，尋找香港政治傳播研究發展的新座標與新起點。

## 一、何謂政治傳播研究

在人類歷史中，政治傳播可謂「古老的現象、年輕的學問」。雖然西方政治傳播現象早在古希臘、羅馬時期便已出現，古希臘修辭學、演講術的興起和發展，也在客觀上成為西方政治傳播研究的源頭（張曉峰、荊學民，2009）。然而，西方學術界普遍認為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傳播研究源於1922年Walter Lippmann在著作《公共輿論》（*Public Opinion*）中關於新聞自由與公共輿論良性互動的研究，這「在當時極大地鼓舞了學者們對於政治傳播研究的熱情」（MeLeod, Kosicki, & McLeod, 2002）。從早期Lazarsfeld, Berelson, & Gaudet (1944)通過對小社區的選舉投票觀察傳媒對候選人之態度及行為影響，到Deutsch (1963)用系統理論的觀念來探討政治溝通（political communication）理論，政治傳播研究一開始側重於從將政治傳播視為一種政治現象與政治行為，學者也往往從政治學角度出發，把政治傳播界定為「以話語為介質的政治過程」，包括：（1）政治系統本身與政治環境間的資訊交流；（2）政治系統本身與政治環境內各份子間的相互影響；以及（3）政府與民眾間包括訊息、意見、經驗、滿意度等在內的交流與分享，以發揮政治系統之管理眾人之事的功能（Fagen, 1996; Kaid, 2004; McNair, 1995; Mueller, 1973; Pye, 1963）。

七十年代以後，西方政治傳播研究開始突破原有的側重從微觀領域研究和分析影響選民個人行為的媒體效果研究，轉向大眾媒體在民主政治體系中的宏觀系統性的角色研究（Nimmo, 1976; Nimmo & Sanders, 1981）。學者開始從傳播學角度對政治傳播研究進行探索，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政治傳播是「關於政治的有目的的傳播」，包括：（1）所有政客及政治行動者為求達到目的而進行的傳播活動；（2）所有非政治行動者對政治行動者作出的傳播活動，例如選民及報紙評論員；以及（3）

所有在媒介中涉及以上政治行動者的新聞報導、評論文章及政治討論等 (McNair, 2005)。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傳播行為不一定是政治行為，但政治行為一定是傳播行為」(Nimmo & Combs, 1990)，政治上的溝通離不開傳播，動態的傳播行為又促使政治權力關係不斷被定義、重構，兩者緊密結合構成的政治傳播研究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出現在美國最大的傳播學及政治學學術組織——國際傳播學會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與美國政治科學學會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的學術分組之中 (黃智誠、李少南，2003)。

隨著當今互聯網等新媒體的興起，「媒介富餘」時代的來臨，專業化需求的加劇、競爭性壓力的增強、反精英民粹主義與「離心多元化」(centrifugal diversification) 的政治變遷過程 (Blumler & Kavanagh, 1999)，政治傳播研究日益呈現出學派林立的盛象，研究內容擴及政治修辭、政治宣傳、公眾態度變遷與傳播效果、媒介與政府關係、政治傳播技術變遷、新媒體等多個領域，進入更加多元化的時期。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政治傳播研究發展早已成為一門獨立的研究領域，但由於其轄下的「政治」學科有狹義及廣義之分，而「傳播」也有社會形構 (social formation) 為本及個人心理為基礎的分野 (黃智誠、李少南，2003)，加之政治傳播研究本身呈現的研究範疇的寬泛性與延展性，如何界定政治傳播研究始終是學者們懸而未決的議題，無論是從政治學面向、抑或是傳播學角度，都難以以一概全，達成學界統一的認知。因此，當下的政治傳播研究如何「尋找一種方法、一種發展的模式，以克服『零碎化』所帶來的不幸後果，使其朝著『有組織的框架』發展」(McQuail, 2000; Nimmo & Sanders, 1981; Nimmo & Swanson, 1990)，成為政治傳播學者不斷探索的課題。

同時，由於政治傳播研究誕生和發展於西方，其研究主體與理論具有很強的地域性特徵。照搬西方的政治傳播理論框架來考察東方政治傳播研究的發展與特點是不現實的。具體到香港而言，香港在政治傳播體制上具有自身獨特性，梳理香港政治傳播研究，需要從香港本土的政治場景 (political context)、尤其是具有重大影響力的事件或趨勢出發來考察香港政治傳播的研究背景。

## 二、香港政治傳播研究的社會政治背景

香港歷經百年殖民統治，形成獨特的社會政治特性。上世紀七十年代學者金耀基(1975)從社會學和政治學的理論架構出發，提出港英治下的香港政治模式為「行政吸納政治」(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politics)模式，即港英統治主要限於精英層的力量吸納、共識建構與行政管理。在精英及其利益集團的管制下，香港呈現出「無黨行政邦」(Harris, 1978)的特點，港民政治意識淡薄、政治參與度低，沒有本土政黨。然而，儘管華人社會與港英政府治下的官僚政體基本互相隔絕，但出於官僚政體與華人社會共同的實用性基本價值傾向，雙方各自恪守職責，使香港得以在複雜的條件下維持著「最低整合的社會—政治系統」(minimally-integrated social political system) (劉兆佳，1982)，保持了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

這樣的社會結構與模式隨著中英談判的到來受到極大衝擊。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英雙方拉開香港回歸的談判進程，兩國勢力在港權力角力過程徐徐展開，香港進入1984至1997年十數年的「二元權力結構」(dual power structure)階段，一方面，中英談判大局已定，英國謀求「光榮撤退」，並在撤出前加快推行包括代議政制在內的一系列「非殖化」措施，大力推動香港的民主改革和「還政於民」，銳意扶植反共和民主派勢力(劉兆佳，2013)；另一方面，中方為確保順利過渡，著力維護香港寬鬆良好的政治經濟環境，培養「愛港愛國力量」，以換取支持和達致統戰的目的。隨著「中英權力漸變模式」(陳韜文，2002)的演變、經濟的發展、教育水準的改進、社會矛盾的增加和民眾對香港回歸後的政治憂慮，「九七」問題初顯。香港民眾政治訴求不斷上升，香港的政治權力架構日趨多元化。1989年北京發生的「六四事件」，更對香港造成前所未有的衝擊(黃智誠、李少南，2003)，衍生出若干重要而又獨特的政治事件與現象。

1997年香港順利回歸中國，中國成為香港唯一的權力中心，香港所面臨的處變之道剛剛開始(王賡武，1997)。隨著主權移交、公營事業市場化、香港的經濟結構轉型，加之數次社會危機如亞洲金融風暴、失業、新移民、禽流感、沙士等突發事件的衝擊，香港社會貧富

差距擴大，社會結構僵化，民眾心情低落。同時，回歸後香港中產階級的質變在頗大程度上改變了特區的政治形勢和生態，一定意義上在回歸之初造成政治動盪、管治艱難的局面(劉兆佳，2013)。如果說九十年代初，香港人基於政治的表現都還只是「積極的旁觀者」(attentive spectator) (Lau & Kuan, 1995)，<sup>3</sup>這一情況到九七前後出現明顯轉變，各種與港人利益息息相關的政治事件不斷，在改變香港社會政治文化的同時，也撩撥著香港傳媒的政治神經，形成新時代下的香港社會政治傳播形態。

獨特的香港政治變遷過程，為香港政治傳播研究提供了極大的誘因。可以肯定，對香港政治傳播的研究與探討將有助於擴充當前全球政治傳播的研究空間，成為現有西方政治傳播理論框架與模型的重要補充。

### 三、香港的政治傳播研究

香港印刷媒體的源頭要追溯到十九世紀中葉。從1841年發行第一份英文報紙《香港公報》(*Hongkong Gazette*)、1858年出版第一份中文報紙《中外新報》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紙質媒體早已呈現「百花齊放」的局面，包括《明報》、《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香港商報》、《天天日報》、《晶報》、《正午報》、《香港夜報》、《新生晚報》等在內的新聞媒體在輿論引導上各抒己見，政治立場鮮明，並由此衍生出香港第一篇比較正式的政治傳播學術論文、1969年Mitchell的《香港報業如何面對十五年來急劇社會轉變》(*How Hong Kong Newspaper Have Responded to 15 Years of Rapid Social Change*)。然而，雖然是時香港傳媒擁有豐富的媒介生態，既承接了本土特殊的現實語境，又兼具西方傳媒制度的理論模型，在中國新聞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但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對它的政治傳播解讀與研究卻乏善可陳。原因有二，一是在八十年代以前，政治議題仍是十分敏感的課題，港民普遍政治冷感；而八十年代以後的香港急速政治化(黃智誠、李少南，2003)，相應影響了香港的社會政治生態，改變了香港的政治傳媒生態；二是傳播學本身也是八十年代才開始在香港各大專院校推廣普及，使香港



政治傳播研究自此興起並活躍起來，產生不少學術論著。曾有學者（陳韜文，1992；陳韜文、蘇鑰機、馬傑偉，1997；黃智誠、李少南，2003）或以時間為線、或以研究對象為限，對不同時期的香港政治傳播研究進行過梳理。例如，黃智誠、李少南（2003）根據「政治」與「傳播」兩種不同的面向，將香港政治傳播劃分為「國家中心」、「社會中心」、「社會形構與傳媒關係」、「與個人及團體相關之傳播效應」四個象限進行歸類，發現香港政治傳播研究大部分集中在以國家為中心並關注社會形構與傳媒關係的課題上。陳韜文、蘇鑰機、馬傑偉（1997）以九七回歸為節點、對之前的香港政治傳播進行了歸納與梳理，為後來研究者提供了參考與啟示。

如今，香港回歸十八載，香港政治傳播研究也在日新月異的社會變遷與政治事件下不斷推陳出新。九七回歸作為香港社會、政治、文化的一個重組過程，意味著權力結構、文化形態、經濟動力等方面的重大改變（陳韜文、黃煜、馬傑偉、蕭小穗、馮應謙，2007），是啟動香港社會變遷的重要的分水嶺，引導著香港政治傳播研究的主題與動向。簡單來講，即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九七回歸前，傳媒怎樣適應和影響政治過渡是初初起步的香港政治傳播研究的重要研究課題；九七回歸前後，民心浮動，民情激蕩，香港政治傳播研究更集中圍繞著權力關係、新聞自由、民意問題與社會運動展開積極探討與論述；回歸之後，香港社會政治不斷衍生新事件，社會形態亦從原來港英時期以經濟為主導的社會，逐漸演變成回歸後以政治參與、政治競爭與政治對抗為主的社會：從2002年23條立法開始，歷經否決2007普選、超級議員選舉、反國教、白皮書、佔中運動、後佔中自治運動等，香港社會正快速成為一個高政治對抗的社會。在這種情形下，香港政治傳播研究邁入了多元蓬勃發展的新階段。因此，本文以九七香港回歸為標誌，將香港政治傳播研究整體劃分為起步期、發展期與蓬勃期三個階段，通過「歷時性」考察，對每一時期的相關研究作出較為全面的總結與梳理，以期展望未來的香港政治傳播研究前景。

## I. 起步期

香港政治傳播研究興起於八十年代初至九七回歸前這一香港政權交接過渡期。在此期間，中英政治角力，雙方影響力此消彼長。正因為中英兩權對立和相互制衡，使得港人有空間尋求本土的身份認同，並展現強烈的民主訴求。媒體總體呈現「百家爭鳴」的局面，政治傳媒研究興起，八十年代起，以李金銓、關信基、陳韜文、蘇鑰機為代表的傳播學者便已立足於當時香港的政治與傳媒發展，圍繞殖民統治與新聞自由、傳媒報導與政黨政治、受眾參與與公眾輿論、社會結構與傳媒專業意理、香港政治過渡期的權力架構與媒介變化等議題展開研究(Chan, 1992; Chan & Lee, 1984, 1988, 1991; Kuan & Lau, 1989; Lee, 1985; Lee & Chan, 1990; So, 1987)。其中，「權力架構與新聞自由」、「政權轉移與媒介角色轉移」成為這一階段討論的重點。

### 1. 權力架構與新聞自由

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前，香港是亞洲新聞自由度最高的地區之一。香港媒體具有西方傳媒制度的現實模型，八十年代初，報章的意識形態甚至支持著它們對港英政府發出的新聞稿件進行處理或刪改(Lee, 1985)。西方的法治、民主、自由、人權等觀念影響香港媒體至今，在1990年、1996年、2006年進行的三次新聞工作者調查中，香港新聞工作者認為「堅持依據事實報導新聞」、「迅速為大眾提供最新資訊」，以及「報導可靠資訊防止流言散播」這三項是新聞媒介最重要的社會功能，十年來都沒變(Chan & Lee, 2007)。

然而，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香港新聞自由與民眾政治參與何去何從成為輿論研究的焦點。這一時期集中探討港英統治時期新聞自由權在媒體訴求和政府權力的博弈中推進和維護，從權力架構基礎預測新聞自由的前景(陳韜文、邱誠武，1987；Chan & Lee, 1984, 1989, 1991; Kuan & Lau, 1988, 1989)，成為香港主權移交前政治傳播研究的熱點之一。研究普遍認為，權力架構的改變會對香港新聞自由產生影響(陳韜文、邱誠武，1987；Chan & Lee, 1984; Kuan & Lau, 1989)，更有1990年的調查顯示69%的香港新聞記者認為九七回歸後的香港自由不甚樂觀(Chan, Lee, & Lee, 2007)。但陳韜文、李金銓(1991)亦提

出，新權力中心凸顯的同時，相反的力量仍舊存在，例如天安門事件，不同意識形態的傳媒報導統一口徑，彰顯此階段香港新聞自由尚可維持相對獨立的狀態。

## 2. 政權轉移與媒介角色轉移

政權轉移與媒介角色轉移是這一時期政治傳播研究的另一重點 (Bonnin, 1995; Chan, 1992; Chan & Lee, 1984, 1991; Fung, 1995; etc.)。1984年12月中英簽訂聯合聲明，香港自此進入權力架構「過渡期」(Chan & Lee, 1991)。對香港未來的不確定性，使香港政治過渡期的媒介角色轉移成為時代的研究課題。李金銓(1990)通過比較研究，提出凡是權力結構有過改變的地方或時期，無論是法國大革命、辛亥革命、中國1949年易權，及至東歐解體、菲律賓人民革命、臺灣地區和韓國的民主化，這個問題都適用。香港是當中的一個案例，它所代表的是權力漸變的模式，有別於革命的劇變。陳韜文及李金銓(1991)所撰《大眾傳媒和政治變遷》作為香港回歸之前唯一一本論述香港傳媒與政權轉移的學術專著，以「傳播媒介不規則地反映權力結構，因此對社會權力關係的轉變亦作出不規則的回應」為理論前提，探討權力結構重組與「新聞範式」轉變的呼應關係。朱立與李少南(1995)對此問題進一步深化，將政府與媒介關係分為宣傳、公關、市場、改革與革命五大類，認為回歸前後的香港媒介模式極有可能完成從改革到宣傳或公關的模式轉變。這一議題延續到香港回歸以後，不少學者都檢視了香港回歸後傳媒如何響應了政治、社會和文化變遷 (Lee, 2000; So, Chan & Lee, 2000; etc.)。

總體而言，起步時期的香港政治傳播研究，研究內容受限於研究人員的數量與香港社會政治事件突變，尚處於被動的研究階段。所幸在興起之初便有一批優秀的本土傳播學者加入，為香港政治傳播研究的品質提供了保障。

## II. 發展期

九七回歸前後，回歸臨近的緊張感與「一國兩制」下的觀念衝擊與

意識形態撞擊，使得香港問題研究成為越來越迫切的實際需要。這一時期為香港政治傳播研究的發展期，當局與傳媒的權力關係、政權交接下的香港新聞自由、政治變遷與香港傳媒表現、角色及新聞倫理道德、「九七問題」引發的民意問題等議題，成為政治傳播研究的主要內容。此間代表學者有陳韜文、李金銓、黃煜、朱立、馮應謙、蘇鑰機等。

### 1. 當局與傳媒的權力關係

研究學者發現，香港回歸前後，當局與傳媒的權力關係發生了變化。這一權力與傳媒之間的關係變化直接投射到傳媒意識形態、新聞自由、媒體角色與表現當中(陳韜文、蘇鑰機、馬傑偉，1997；Atwood & Major, 1996; Bonnin, 1995; Chan & To, 1999; Lee, 1997, 1998; McIntyre, 1995; Wilkins & Bates, 1995; So, 1996, 1999; So & Chan, 1999)。具體來講，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前，港英當局與傳媒只是一種「低度整合」的權力關係(Kuan & Lau, 1989)，很大程度上只透過控制當局資訊的發放和籠絡傳媒老闆(例如給予他們殖民地的勳銜之類)來影響民意，很少直接以行政命令或法規控制傳媒(陳韜文、蘇鑰機、馬傑偉，1997)。相比之下，中方與傳媒的權力關係更為密切(陳韜文、李立峯，2009a)。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中方都與香港傳媒機構保持積極互動，或通過邀請傳媒機構老闆和高層加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或特區籌備委員會、或委任以政協代表名銜、或假以生意關照的方式，籠絡收編媒介力量以維和香港回歸過程中的媒體輿論環境。另一方面，朱立及李少南(1998)發現回歸前後香港原本親英的主流媒體有接近北京方面並接受其管治的強烈傾向，陳韜文、李立峯(2009)指出這種密切聯繫在回歸後亦未發生改變，表現為「非機構性的媒介擁有權集中」(馮應謙，2007)。正由於香港傳媒機構持有者與大陸當局的聯繫普遍割捨不斷，進而對香港傳媒角色、表現、新聞倫理道德、所有制及傳媒競爭產生影響(黃煜、俞旭，1996；陳韜文、蘇鑰機、馬傑偉，1997；Chu & Lee, 1998; etc.)。

## 2. 「九七問題」引發的民意問題

「九七問題」引發的民意問題(王家英, 1996; 羅永生, 1997; Atwood & Major, 1996; Wilkins & Bates, 1995; Willnat, 1996; Willnat & Wilkins, 1997) 此間亦受到學界關注。二戰後出生的香港新生代經歷了港英治下的香港經濟起飛及日益完善的社會制度, 具備身份上的優越感; 九七回歸前後之於未來的不確定性, 加上九七金融風暴, 香港民眾產生回歸後身分認同危機, 身份的訴求又引發民主訴求, 形成一系列政治事件。學者集中探討了媒體之於民意問題的影響 (Atwood & Major, 1996; Wilkins & Bates, 1995; Willnat, 1996; Willnat & Wilkins, 1997), 認為媒體播報內容所呈現的「焦灼感」直接影響了「九七問題」下的民意問題。

社會的種種不確定性彙聚激蕩, 致使發展期的香港政治傳播研究緊緊圍繞著九七回歸下的政治權力與民情民意展開。一方面, 這一時期的研究具有較強的時效性與針對性, 另一方面, 接二連三的社會政治事件在為本土政治傳播研究提供了動力與源泉的同時, 也客觀局限了研究的總體視野。

## III. 蓬勃期

九七回歸以後的香港政治傳播研究進入了蓬勃發展的新階段。香港在回歸十八年(1997-2015)間所經歷的、包括金融海嘯、「新移民」、非典、五十萬人七一遊行、特首更迭、香港公營廣播檢討、反國教、保普選運動、雨傘運動等在內的重大政治經濟事件, 使得媒體熱點頻出, 報導呈現出一種「沒落的焦慮」(陳韜文、李立峯, 2009); 另一方面, 大陸和香港兩地互相接觸和互相影響越來越頻繁, 出現「國族化」和「本土化」的角力(陳韜文、李立峯, 2007)。在此期間, 香港的社會、政治以及傳媒變遷、回歸後的新聞自由、自我審查、傳媒與國家民族論述、國家認同、身份認同、公民社會之形成、傳媒與社會運動、選舉與民意、本土意識與傳媒「代議」功能、新媒體與政治動員等成為新時期的政治傳播關注焦點。代表學者有陳韜文、馮應謙、李立峯、馬傑偉、郭中實、杜耀明等。

## 1. 關於香港的社會、政治與傳媒變遷

關於香港的社會、政治與傳媒變遷的討論，依然是圍繞著「香港回歸」這一重要座標展開。2007年，香港學界及大眾傳媒都卷起過一陣研討風潮，討論回歸十年給香港社會帶來的種種影響。陳韜文、李立峯(2009)提出回歸後的香港傳媒與政治權力互動的「再國族化、<sup>4</sup>國際化和本土化」分析框架，將各種各樣影響著傳媒的表現和運作的因素歸納為以上三股力量，指出它們之間的角力和牽扯，令香港傳媒的形態和運作複雜多變。李立峯(2007)提出，回歸後的香港「再國族化」是一個整體的社會趨勢，可以說是一個「文化共向」<sup>5</sup>的過程。這一過程可能令新聞工作者對事物的判斷有所改變，令香港新聞界對中央政府某些議題的判斷有所改變。

## 2. 回歸後的新聞自由與自我審查問題

同時，回歸後的新聞自由與自我審查問題引發關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在1990年和1996年曾分別對香港的新聞工作者作出調查，調查表示超過一半人認為同行曾施行某種自我審查，而大約四分之一的受訪者承認他們自己害怕批評中國(陳韜文、李少南、李金銓，1996)。在2001年一次新聞工作者調查研究中，發現其中13.2%認為自我審查在香港是一個嚴重的問題，而另外57.4%的新聞工作者則認為問題存在但不算太嚴重(李立峯、陳韜文，2009)。但當2006年再次進行同類調查研究的時候，認為自我審查嚴重的新聞工作者就上升至26.7%。同年在香港市民調查研究中發現，接近半數香港市民認為，當中國大陸和香港有利益衝突時，香港傳媒是應該站在香港一邊的。而這些認為香港傳媒應該維護本土利益的市民，同時傾向認為香港傳媒在中港衝突問題上有自我審查的情況(陳韜文、李立峯，2007)。另外，同一研究發現，愈是認同傳媒在有民意基礎及事實根據時不必保持中立的香港市民，愈覺得香港的新聞自由正在減退當中(李立峯，2007，2011)。<sup>6</sup>在如非典爆發、國家安全法爭議、國民教育、全民普選等涉及中港衝突的議題上，「客觀中立」的報導已經不能令絕大部分市民感到滿意。陳韜文、李立峯(2007)認為，一方面，在可見的將來，涉及中港衝突的議題將為香港傳媒帶來很大的挑戰；另一方面，

在傳媒的表現上，政權易手固然令媒體在一些問題上有所顧忌，甚至向權力傾斜，但商業傳媒同時也有自身的市場考慮，香港電臺沒有變成政府喉舌，《蘋果日報》繼續暢所欲言。不少傳媒工作者依然堅守新聞專業主義，中國和特區政府也表示維護香港的新聞自由，再加上國際間對香港新聞自由的關注，都使得香港傳媒並未完全臣服於中港權力架構之下。

然而，亦有學者指出，風光表面的背後卻是政經權力滲透而傳媒日漸馴化的景象：回歸十年來，香港報業的格局基本沒有太大變化，但是很多報紙的所有權都發生了轉換（黃煜，2007），呈現愈來愈多媒體的擁有權易手親中商人、烽煙節目的衰落、自我審查的加劇等。隨著中港文化漸漸趨同，新聞從業員和市民大眾對大陸態度的轉變，香港傳媒處理中國新聞時亦不如以往具有批判性。在這種大環境下，香港傳媒的言論空間正慢慢收窄。伴隨內地的經濟發展，香港會進一步倚靠中國，香港傳媒面對的政經壓力只會有增無減。香港能否保住新聞自由，固然要看一國兩制能否貫徹執行和香港的政制是否真的實行民主化，同時也要看傳媒機構和新聞工作者能否堅守新聞專業和市民大眾是否擁有捍衛新聞自由的決心（李立峯，2007，2013；李金銓，2000；陳韜文、李立峯，2003；劉端裕、杜耀明，2007）。

### 3. 民意調查研究

民意調查研究亦是此階段研究的重點。民意調查是成熟的公民社會獲取大眾意見必備的環節。注重民調的傳統在港英時期就已形成，發展至今成為每個香港人常常掛在嘴邊的日常詞彙。它不僅可以收集大眾對某項政策、事件的意見，更大的威力在於它匯總了大眾的意見之後，能對社會產生實際的影響，從而直接成為監督政府、參與社會事務的重要途徑。在香港，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都有民意調查中心，而傳媒的民調大多是委託這些學術機構去做，然後自己發佈。例如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幾乎每個月對官員進行一次滿意度和支持率的調查，這一調查從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開始，對最高長官以及各級官員進行民望調查，並形成慣例。而類似的還有香港中文大學的亞太研究所和浸會大學過渡時期研究計劃等。

香港的民調能夠有今日備受關注和信任的地位，全憑數十年來苦心經營不斷積累起來的口碑。香港大學民意調查研究計劃給自己設立的第一條規定就是：無論誰給錢做調查，調查的學術範圍問題任何其他人不得插手。這也是全港民調共同認可的原則。其次，自己所做的調查，不予評價，如果需要評價，則需請其他教授學者，也是為了避嫌。最後則是不會給媒體獨家新聞的機會(鍾庭耀，2012)。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羅文輝(2012)認為之所以民調值得重視，是因為它採用了科學的方法來反映民意，所以調查是否科學中立也是民調口碑的成敗所在。

然而，民調必須中立，民意卻可塑造。陳韜文(2007)談到傳媒運作、民調及民意三者關係時指出，香港是個非常多元化的社會，如何判斷真正民意不是易事：一方面，在市場和專業主義的考慮之下，一些香港傳媒機構發展出一套包括增加採用民意調查作為「客觀」的民意指標的應變策略(陳韜文，2003)；另一方面，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樣那樣的民意在傳媒上聚焦，媒體加以報導評論，發揮「代議」功能的同時亦彰顯出對民意的塑造，因而有人認為民意是傳媒「造」出來的。正如香港中環天星碼頭鐘樓清拆引發的「集體回憶」，民意的瞬間爆發，傳媒的功能顯而易見(李立峯，2006；李立峯、陳韜文，2011)。當然，傳媒也不可能偏離真正民意去胡亂製造某類民意，波及全民的社會運動，如2003年七一遊行、2012年反國教運動，以及近期的保普選運動、雨傘運動，當中傳媒即反映出社會結構性的民意，應當引起政府重視。

雖然傳媒在影響民意方面的作用舉足輕重，但是社會運動中大眾的民意反過來也會影響傳媒的運作。陳韜文、李立峯(2007)曾以「修正政治平行」來形容傳媒如何受民意影響。所謂「政治平行」，指的是香港報章的政治意識分佈和政壇上的政治光譜是平衡對應的。政治上若有保守和開放兩派，那麼在媒體間也有保守和開放的機構。陳、李在研究中發現，在「民意激蕩」(energized public opinion)的狀況下，傳媒需要回應民意，因而不同報紙的論述會變得類似，政治平衡會減弱，甚至暫時消失。在七一遊行的案例裡，最明顯的便是《東方日報》和《文匯報》兩份政治立場較保守的報紙的轉變，如《東方日報》在七一前視外



國勢力和政客為遊行的罪魁禍首，七一時卻向民意靠攏，將矛頭指向特區政府；《文匯報》亦由七一前完全支持立法，轉變為在七一期間建議大幅修訂法例內容，對遊行人士亦不再有負面的評述（陳韜文、李立峯，2003）。當然，這並不表示這兩份報紙變得和其他報紙一樣或者變得支持遊行，但是它們不得不作出修正，如不再貶低遊行人士或支持不受歡迎的政府政策。縱使待民意較平靜時，政治平行會重新出現，但是這案例反映，即使是向權力靠攏的傳媒，也不得不在強大的民意前有所收斂。換句話說，服從「再國族化」大潮的香港傳媒，則可以將民意看成本錢，抵抗權力中心的步步進逼（陳韜文、李立峯，2007）。

#### 4. 媒體「代議功能」與社會運動

陳韜文和蘇鑰機（2003）發展出傳媒的「代議功能」概念來解釋回歸後的香港傳媒如何消除社會繃緊的狀態和一觸即發的衝突，並以此說明香港傳媒對社會結構缺乏民主的補充作用。由於民主低度發展，香港只有一部分民選的議會代表，而且他們的權力受制於行政主導的政府，市民的意見不能從議會反映，大眾媒介因而變成民意代表，承擔著提供討論平臺、促進官民溝通、批評政府、提出政策建議和鼓勵社會改革的功能。傳媒的「代議功能」讓社會大眾發聲、共同投入香港事務以建構身份認同，傳媒擔當這角色既填補了香港政治現實的不足，同時也為自己找到定位，以抵消「再國族化」的衝擊。一些傳媒以維護本土利益為賣點，批評特區和中央政府。它們強調以公民社會為根本，而非以高高在上的官商巨賈為重，當中比較突出者如《蘋果日報》和電臺烽煙節目；其中，電臺節目經常邀請政府官員出席或來電，以回答觀眾的提問，主持人更不時向官員質詢，因而深受廣大市民歡迎，對民意產生一定的影響（李立峯，2007）。

傳媒「代議功能」為民意發聲，進一步影響了政治，當中最重要的案例就是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一些中國政府官員事後點名指《蘋果日報》和電臺烽煙節目動員市民上街遊行。原因在於，首先，傳媒報導社會領袖和政治團體上街的呼籲，媒體將這些領袖如天主教主陳日君或教協等的呼召放大，無形中將示威合法化；第二，傳媒大量報導有關民主遊行的資訊，使遊行成為市民大眾廣泛討論的議題；第三，媒

介傳達「促進行動」的資訊十分重要，有助於讀者的具體參與(陳韜文、李立峯，2007)。

固然，傳媒提供大量資訊，電臺、電視及報紙迴圈報導，令本土的民主運動成為大眾的焦點，但是傳媒如何報導遊行更能影響大眾對事件的觀感(Kuan & Lau, 1989)。傳媒是構成公共論述最重要的一環，例如，在五十萬人上街之後，不同的傳媒紛紛以理性、和平來肯定遊行，正面的評價令集體行動變得合理。2003年七一遊行後，第二十三條立法擱置，一些主要官員下臺，甚至後來更迭特首，這些都被視為人民力量的勝利，「七一效應」的論述成為民意影響政治的象徵。

## 5. 本土意識與利益

回歸之後，政治體制的發展未能滿足香港民眾的民主訴求，港民本土意識時而高漲，而傳媒的運作與所在地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環境互相影響，傳播內容亦要顧及本土利益(陳韜文、李立峯，2011)。因此，在本土意識和利益高漲期間，傳媒或被動響應，或推波助瀾，對公民社會的形成產生越來越重要的影響(陳韜文、李立峯，2009)。谷淑美(2007)以三次公民權利的事件為個案，研究媒體如何利用本土意識製造和爭奪對於「秩序」的論述，而「秩序」論述又如何影響公民社會。研究發現，香港社會的意識形態雖然強調法治和秩序，傳媒亦對此認同，但在輿論爭議中又提倡公民抗命，使得「秩序」在公民社會運動的衝擊下時有改變。隨著新媒體的崛起，成為公民社會運動傳播的新媒介，同時，不同的公民行動令媒體反主流論述得以冒起，認同公民抗爭的詞匯在公眾媒體領域出現，進一步豐富與促進了強調本土意識與利益的公民社會運動(李立峯，2014；陳韜文、李立峯，2007；蘇鑰機、陳韜文、李金銓，2000；Lee & Chan, 2013)。

多元化的媒體景象與複雜的政治事件、政治運動交織在一起，使香港政治傳播研究的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不斷擴充，呈現出蓬勃發展的研究勢態。目前，以「回歸後的香港傳媒、政治、經濟角力」、「新形勢下香港傳媒業者和傳媒機構面臨的挑戰」、「新聞自由的衝擊、北京因素與自我審查」、「本土意識與傳媒」、「傳媒與社會運動」、「傳媒與選舉」等熱點問題為核心的政治傳播研究仍在進行當中。

## 四、香港政治傳播研究的前景展望

總體而言，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起，香港出現一批活躍的政治傳播研究學者，根據香港政治變遷與傳媒發展的獨特性，展開了深具學術意義的研究活動。這一關涉香港未來發展前景的重要研究領域，如何在嶄新的媒體時代獲得更大更深遠的進步？本文認為，香港政治傳播研究可以朝著研究廣度與深度的面向不斷發展。首先，從廣度上看，不妨考慮：

### I. 研究方法的超越

如前所述，政治傳播研究是一門跨學科的交叉研究領域，兼具對政治的傳播學分析、以及對傳播的政治學分析。因此，最為理想的政治傳播研究，莫過於超越固有傳播學與政治學的學科壁壘，站在跨學科的角度，來審視政治傳播學，實現政治學與傳播學的「視界融合」。因此，如何在研究時綜合運用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相關研究方法，將其更好地融入到政治傳播研究的學術場域，建構出一種方法融合下的新形態的「政治傳播學」，將是今後政治傳播研究的努力方向，亦是對本港政治傳播研究學者研究與整合能力的挑戰。

### II. 研究領域的擴展

所謂「往裡去，向外走」（肖小穗，2015）的跨文化研究視角，同樣適用於香港政治傳播研究的擴展方向。香港政治傳播學雖應立足於本土場景與特徵，卻不可受縛於此，而是要有「立足本土，放眼天下」的研究胸懷，試圖通過縝密的思考、找尋若幹對香港研究有意義或有價值的比較對象進行異同比較，來揭示研究個案的共性與特性，由此提煉出具有普遍理論意義的問題。通常來講，一些跨地域、跨文化的比較性研究文章，經類比分析反而可以更加清晰地探掘出香港政治傳播當前問題之所在。例如陳韜文（1997）從國家和地區經濟政治制度的角度對香港與新加坡的新聞體制特點作出比較，通過分析認為，兩地新

聞自由的高低差異主要出於彼此不同的總體權力結構。正是這樣的比較性研究，有助於使我們的研究視野與意義超越地方背景的限制，在國際學術領域找到相應的位置。

### III. 研究對象的更新

新聞消費模式正在發生改變(黃煜, 2007)。在全球媒體邁向「數位化」的步伐之中, 香港緊跟風潮, 民眾新聞消費從廣播、報紙轉移到互聯網、移動電話等新媒體乃至自媒體之上。網路的使用關涉政治參與受眾的改變(李立峯, 2014; 陳韜文、李立峯, 2013), 港人作為一個整體, 尤其是以「第四代」(呂大樂, 2007)、甚至「第五代」香港人為代表的年輕一輩, 產生自治理念和香港利益, 儼然已成為目前香港政治傳播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如反國教運動中學民思潮的成員便大都以十多歲的大中學生為主。因此, 「更新」香港政治傳播研究的研究對象, 將研究著眼點投放至新媒體、自媒體, 以及以八零後、九零後為主的「新一代」香港人身上, 是實證研究與時俱進之要求, 亦是傳播學者們面臨的新課題。

### IV. 以話語修辭分析研究問題

正因為「政治傳播是社會階級、語言及社會化形態的政治結果」(Mueller, 1973), 因此, 不論「政治傳播」被界定為側重傳播面向的「關於政治的有目的的傳播」, 還是側重政治面向的「以話語為介質的政治過程」, 其過程都離不開政治活動參與主體間的資訊交往實踐, 而資訊交往的實踐又必然涉及到對政治傳播的微觀層面——話語的研究與修辭分析。如何考察不同社會階層/活動主體間圍繞各種利益議題所展開的話語溝通行為, 探索蘊含其中的各類修辭技巧的傳播與運用, 能夠於細微之處更好地探尋問題解決中策略的變化, 具有很強的研究指導意義。例如谷淑美(2007)對於媒體之於「秩序」的話語權力建構與爭奪, 黃盈盈(2007)對董建華時期學生運動話語權力建構的考察等, 均是從話語修辭層面對政治傳播事件進行考察, 是對政治傳播研究普遍

採用的宏觀研究視角的有益補充，亟待發展。

## V. 研究層面的深度化

從整體上看，香港政治傳播研究更多限於「新聞、媒介」領域，比較缺乏在政治傳播更為內在的本質內涵即「政治內容」上的縱深推進，而政治傳播研究本身之於社會精英、媒體所有權、社會等級等對政治傳播控制與影響的現象考察，必然會涉及政治、經濟制度層面的社會結構問題。涉及更深層面的分析，方可在羅列現象、分析學理的同時，作出實際的應對選擇，達到促進香港社會政治文明的目標。這也是香港政治傳播研究力圖達至的研究意義之一。

## VI. 研究理論的探索

由於地域性的原因，香港政治傳播研究多偏重實證研究，較少理論提升。然而，不管政治傳播研究的社會生態怎樣變動、地域特性如何不同，事件的發生總有一定的規則或模式可循，因此，對理論的探索與追尋應始終是傳播學者的研究責任。如何將源於西方的政治傳播理論重新置於香港的學術場域進行嚴謹的學理性探索，挑戰主流理論，針對問題提出新的詮釋，或是有系統地闡述新的概念，不僅或能促使華人社會政治傳播理論的概念得到更多世界學者的認同，亦有助於加強東西方學界在政治傳播理論上的交流，使香港政治傳播研究真正從「本土化」邁向「國際化」，邁向更長更深遠的研究目標。

## 結語

總體而言，政治傳播研究領域至今尚未定形，仍處在不斷探索的過程中。香港政治傳播研究基於自身的獨特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價值與廣闊的拓展空間。從文獻梳理中可發現，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的香港政治傳播生態一直在演變，但研究的主題始終與「新聞自由」、「政治意識形態」、「權力重組」、「建構現實」等主題聯繫在一起，反映

出本土研究持續的社會關注熱點，及香港政治傳播研究之於港人的利益攸關。作為本港的政治傳播研究學者，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去關注與研究同香港社會發展前景息息相關的各種政治傳播現象與問題，既要努力突出「東方之珠」的政治生態獨特性，從縱深方向建構根植於「本土」的政治傳播學研究，又要堅持對政治傳播概念和理論進行不懈的學理性探尋，積極向「國際化」邁進。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香港政治傳播研究發展三十餘年，活躍於該領域的專業學者仍是屈指可數。如何培養香港本土的政治傳播研究人才，使這一必要、重要的研究領域隨著時代的發展，在獅子山下不斷發展壯大，成為香港政治傳播研究目前面臨的最迫切的問題。

## 註釋

- 1 截至2013年底，香港的大眾傳播媒介包括55份日報(其中25份中文日報、12份英文日報、9份中英文雙語日報，和5份日語報章)、715份期刊、兩家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持牌機構、三家本地收費電視節目服務持牌機構、19家非本地電視節目服務持牌機構、一家公營廣播機構，以及四家聲音廣播持牌機構。資料來源：2013年《香港年報》。
- 2 1977年國際報業協會在評比亞洲各地新聞自由時，香港名列第二。
- 3 關信基、劉兆佳(1989)指出香港政治傳播的受眾對政治資訊有強烈的需求，是「專注的公眾」(attentive public)，後對此概念進行修正，認為此種專注並未能化為政治行動，因此應是「專注的旁觀者」(attentive spectator)。
- 4 指香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本土社會和意識成形之後，在過去二十年來又再次跟中國大陸在政治、經濟以及文化上整合的過程。
- 5 李立峯(2007)認為，回歸之後，大陸和香港社會交流越趨頻繁，越來越多香港人北上消費、工作甚至成家立業，而新移民及內地遊客亦隨投資移民及旅遊政策的放寬而增多。再加上中央政府近年透過傳媒對香港民眾進行愛國教育，可以說是一個「文化共向」的過程。
- 6 此調查結果與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2007年10月的調查結果類似，即近半數香港受訪市民認為香港傳媒存在自我審查，逾六成市民認為傳媒在批評中央政府時有所顧忌。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王賡武 (1997)。〈談香港政治變遷〉。《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41期，頁76–82。
- Wang Gengwu (1997). Tan Xianggang zhengzhi bianqian. *Ershiyi shiji shuangyuekan*, 41, 76–82.
- 呂大樂 (2007)。《四代香港人》。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 Lv Dale (2007). *Disidai Xianggang ren*. Xianggang: Jinyibu duomeiti youxian gongsi.
- 李立峯 (2007)。〈策略互動、文化共向和九七回歸後香港新聞自由的發展〉。《傳播與社會學刊》，第3期，頁31–52。
- Li Lifeng (2007). *Celue hudong, wenhua gongxiang he jiuqi huigui hou Xianggang xinwen ziyou de fazhan*.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3, 31–52.
- 李少南 (2015)。《香港傳媒新世紀 (第二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Li Shaonan (2015). *Xianggang chuanmei xinshiji* (2nd ed.).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chubanshe.
- 杜耀明、聶依文 (編) (1995)。《傳媒策略與選舉》。香港：香港人文科學出版社。
- Du Yaoming, Nie Yiwen (Ed.) (1995). *Chuanmei celue yu xuanju*. Xianggang: Xianggang renwen kexue chubanshe.
- 杜耀明 (1999)。〈殖民統治與新聞自由：香港的經驗〉。俞旭、郭中實、黃煜 (主編)，《新聞傳播與社會變遷》(頁281–296)。香港：中華書局。
- Du Yaoming (1999). Zhimin tongzhi yu xinwen ziyou: Xianggang de jingyan. In Yu Xu, Guo Zhongshi, Huang Yu (Eds.), *Xinwen chuanbo yu shehui bianqian* (pp. 281–296). Xianggang: Zhonghua shuju.
- 馬傑偉 (2007)。《後九七香港認同》。香港：VOICE。
- Ma Jiewei (2007). *Hou jiuqi Xianggang rentong*. Xianggang: VOICE.
- 陳韜文、邱誠武 (1987)。〈從權力基礎看香港新聞自由前景〉。《明報月刊》，5月號，頁10–14。
- Chen Taowen, Qiu Chengwu (1987). Cong quanli jichu kan Xianggang xinwen ziyou qianjing. *Mingbao yuekan*, 5, 10–14.
- 陳韜文 (1992)。〈香港傳播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朱立、陳韜文 (編)，《傳播與社會發展》(頁417–442)。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出版。
- Chen Taowen (1992). Xianggang chuanbo yanjiu de huigu yu qianzhan. In Zhu Li,

- Chen Taowen (Ed.), *Chuanbo yu shehui fazhan* (pp. 417–442). Xianggang: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xinwen yu chuanbo xuexi chubanshe.
- 陳韜文(1997)。〈權力結構、經濟發展與新聞體制：香港與新加坡的比較〉。《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第3期，頁1–11。
- Chen Taowen (1997). Quanli jiegou, jingji fazhan yu xinwen tizhi: Xianggang yu Xinjiapo de bijiao. *Xiandai chuanbo: Zhongguo chuanmei daxue xuebao*, 3, 1–11.
- 陳韜文、馬傑偉、蘇鑰機(1997)。〈回到未來：香港大眾傳媒的回顧與前瞻〉。鄭宇碩(編)，《香港評論》(頁415–438)。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Chen Taowen, Ma Jiewei, Su Yaoji (1997). Huidao weilai: Xianggang dazhong chuanmei de huigu yu qianzhan. Zheng Yushuo (Ed.), *Xianggang pinglun* (pp. 415–438).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chubanshe.
- 陳韜文、黃煜、馬傑偉、肖小穗、馮應謙(2007)。〈寫在卷首——追尋香港回歸傳媒與政治的理論意義〉。《傳播與社會學刊》，第3期，頁III–VI。
- Chen Taowen, Huang Yu, Ma Jiewei, Xiao Xiaosui, Feng Yingqian (2007). Xie zai juanshou—zhuixun Xianggang huigui chuanmei yu zhengzhi de lilun yiyi.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3, III–VI.
- 陳韜文、李立峯(2007)。〈再國族化、國際化與本土的角力：香港的傳媒和政治〉。《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101期，頁43–57。
- Chen Taowen, Li Lifeng (2007). Zaiguozuhua, guojihua yu bentu de jueli: Xianggang de chuanmei he zhengzhi. *Ershiyi shiji shuangyuekan*, 101, 43–57.
- 陳韜文、李立峯(2007)。〈序言：香港回歸後的傳媒與政治〉。《傳播與社會學刊》，第3期，頁17–30。
- Chen Taowen, Li Lifeng (2007). Xuyan: Xianggang huiguihou de chuanmei yu zhengzhi.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3, 17–30.
- 陳韜文、李立峯(2009a)。〈香港的傳媒、政治與社會變遷〉。《國際新聞界》，第182期，頁11–16。
- Chen Taowen, Li Lifeng (2009a). Xianggang de chuanmei, zhengzhi yu shehui bianqian. *Guoji xinwenjie*, 182, 11–16.
- 陳韜文、李立峯(2009b)。〈從民意激盪中重構香港政治文化：七一大遊行公共論述分析〉。馬傑偉、吳俊雄、呂大樂(編)，《香港文化政治》(頁53–78)。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
- Chen Taowen, Li Lifeng (2009b). Cong minyi jidang zhong chonggou Xianggang zhengzhi wenhua: qiyi dayouxing gonggong lunshu fenxi. Ma Jiewei, Wu Junxiong, Lv Dale (Eds.), *Xianggang wenhua zhengzhi* (pp. 53–78). Xianggang: Xianggang daxue chubanshe.



- 陳韜文、馬傑偉、陳智傑 (2009年10月15日)。〈在政治困局中爭取落實公共廣播〉。取自香港電臺網，[http://www.rthk.org.hk/mediadigest/20091015\\_76\\_122397.html](http://www.rthk.org.hk/mediadigest/20091015_76_122397.html)
- Chen Taowen, Ma Jiewei, Chen Zhijie (2009, Oct. 15). Zai zhengzhi kunju zhong zhengqu luoshi gonggong guangbo. Retrieved from Xianggang diantaiwang, [http://www.rthk.org.hk/mediadigest/20091015\\_76\\_122397.html](http://www.rthk.org.hk/mediadigest/20091015_76_122397.html)
- 黃煜、俞旭 (1996)。〈惡性競爭下的香港新聞業〉。《國際新聞界》，第1期，頁18-23。
- Huang Yu, Yu Xu (1996). E' xing jingzheng xia de Xianggang xinwenye. *Guoji xinwenjie*, 1, 18-23.
- 黃智誠、李少南 (2003)。〈香港的政治傳播研究〉。《新聞學研究》，第74期，頁1-17。
- Huang Zhicheng, Li Shaonan (2003). Xianggang de zhengzhi chuanbo yanjiu. *Xinwenxue yanjiu*, 74, 1-17.
- 黃盈盈 (2007)。《董建華時期的學生運動：權力修辭分析》。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博士論文。
- Huang Yingying (2007). *Dong Jianhua shiqi de xuesheng yundong: quanli xiuci fenxi*. Jinhui daxue chuanli xueyuan boshi lunwen.
- 張曉峰、荊學民 (2009)。〈現代西方政治傳播研究述評〉。《教學與研究》，第7期，頁76-85。
- Zhang Xiaofeng, Jing Xuemin (2009). Xiandai xifang zhengzhi chuanbo yanjiu shuping. *Jiaoxue yu yanjiu*, 7, 76-85.
- 楊麗娟 (2007)。〈回歸十年，香港報業的變與不變——訪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主任黃煜〉。《中國報業》，第7期，頁23-25。
- Yang Lijuan (2007). Huihui shinian, Xianggang baoye de bian yu bubian—fang Xianggang jinhui daxue xinwenxi zhuren Huang Yu. *Zhongguo baoye*, 7, 23-25.
- 劉兆佳 (2013)。《回歸後的香港政治》。香港：商務印書館。
- Liu Zhaojia (2013). *Huihui hou de Xianggang zhengzhi*. Xianggang: shangwu yinshuguan.
- 肖小穗 (2015年7月8日)。〈學術要走出去，不能關在門裡做學問〉。取自中國社會科學網，[http://www.cssn.cn/zt/zt\\_xkzt/xwcbxzt/kwhcb/zjzc/201507/t20150708\\_2070992.shtml](http://www.cssn.cn/zt/zt_xkzt/xwcbxzt/kwhcb/zjzc/201507/t20150708_2070992.shtml)
- Xiao Xiaosui (2015, July 8). Xueshu yao zou chuqu, buneng guanzai menli zuo xuewen. Retrieved from Zhongguo shehui kexuewang, [http://www.cssn.cn/zt/zt\\_xkzt/xwcbxzt/kwhcb/zjzc/201507/t20150708\\_2070992.shtml](http://www.cssn.cn/zt/zt_xkzt/xwcbxzt/kwhcb/zjzc/201507/t20150708_2070992.shtml)

- 羅永生(1997)。《誰的城市？一戰後香港的公民文化與政治論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Luo Yongsheng (1997). *Shui de chengshi? Yizhanhou Xianggang de gongmin wenhua yu zhengzhi lunshu*. Xianggang : niujin daxue chubanshe.
- 關信基、劉兆佳(1989)。〈香港的傳播與政治〉。《明報月刊》，1月號，頁18-26。
- Guan Xinji, Liu Zhaojia (1989). Xianggang de chuanbo yu zhengzhi. *Mingbao yuekan*, 1, 18-26.
- 關信基(2002)。〈傳媒與選舉：1998年香港立法會選舉經驗〉。《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23期，頁1-16。
- Guan Xinji (2002). Chuanmei yu xuanju : 1998 nian Xianggang lifahui xuanju jingyan. *Xianggang shehui kexue xuebao*, 23, 1-16.

####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Atwood, L. E., & Major, A. M. (1996). *Good-bye, gweilo: Public opinion and the 1997 problem in Hong Kong*.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 Blumler G., & Kavanagh D. (1999). The third age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fluence and feature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6 (3), 210.
- Bonnin, M. (1995). The press in Hong Kong—Flourishing but under threat. *China Perspectives*, 1, 48-59.
- Chan, J. M. (1992). Mass media and socio-political formation in Hong Kong, 1949-1992.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3), 106-129.
- Chan, J. M., & Lee, C. C. (1984). Journalistic paradigms on civil protests: A case study of Hong Kong. In A. Arno, W. Dissanayake (Eds.), *The news media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pp.183-202). Boulder, CL: Westview and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Chan, J. M., & Lee, C. C. (1988). Press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control in Hong Ko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5(2), 185-197.
- Chan, J. M., & Lee, C. C. (1991). *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The Hong Kong press in China's orbit*. New York: Guildord Press.
- Chan, J. M., & Lee, F. L. F. (2007). Media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A decade after the handover. *China Perspectives*, 2007(2), 49-57.
- Chan, J. M., & Lee, F. L. F. (2011). The primacy of local interest and press freedom in Hong Kong: A survey study of journalists. *Journalism*, 12, 89-105.
- Chan, J. M., Lee, P. S. N., & Lee, C. C. (1996). *Hong Kong journalists in transitio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Chan, J. M., & So, C. Y. K. (2003). The surrogate democracy function of the media: Citizens' and journalists' evaluations of media performance. In Lau, S. K., Lee, M. K., Wan P. S., & Wong, S. L. (Eds.),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 Hong Kong* (pp. 249–276).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Chan, J. M., & To, Y. M. (1999). Democratization, reunification and press freedom in Hong Kong: A critical event analysis of the Xi Yang case. In So, C. Y. K., & Chan, J. M. (Eds.), *Press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Case studies from 1967–1997* (pp. 465–495).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Chu, L. L., & Lee, P. S. N. (1995).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Hong Kong: Transition, adaptation, and survival.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2), 1–17.
- Denton, R. E., & Woodward, G. C. (1990).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Praeger.
- Deutsch, K. W. (1963). *The nerves of government: Model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New York: Free Press.
- Fung, A. Y. H. (1995). Parties,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 A study of media's legitimation of party politics in Hong Kong.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2), 18–46.
- Fung, A. Y. H. (2007).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Hong Kong media: Producing a hegemonic voice.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2), 159–171.
- Harris, P. (1978). *Hong Kong: A study in bureaucratic politics*. Hong Kong: Heinemann.
- Kaid, L. L. (2004).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NJ: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 Ku, A. S. M. (1999). *Narratives, politics, and the public sphere: Struggles over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final transitional years in Hong Kong (1992–1994)*. Aldershot, Brookfield, USA, Singapore and Sydney: Ashgate.
- Ku, A. S. M. (2007). Constructing and contesting the “order” imagery in media discourse: Implications for civil society in Hong Kong.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2), 201–214.
- Kuan, H. C., & Lau, S. K. (1989). Mass media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Media Asia*, 92 (4), 185–199.
- Lau, S. K. (1982).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Lau, S. K., & Kuan, H. C. (1995). The attentive spectator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14(1), 3–24.
- Lazarsfeld, P. F., Berelson, B., & Gaudet, H. (1944). *The people's choice: How the voter makes up his mind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ee, A. Y. L. (1987). *Constructing election reality: A news-making study on the first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in Hong Kong*. Unpublished master dissert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 Lee, C. C. (1985). Partisan press coverage of government news in Hong Kong. *Journalism Quarterly*, 62, 770–776.

- Lee, C. C. (ed.) (1990). *Voices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journalism and politic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Lee, C. C. (1997). Media structure and regime change in Hong Kong. In Chan, M. K. (ed.), *The challenge of Hong Kong's reintegration with China* (pp. 113–147).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Lee, C. C. (1998). Press self-censorship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Hong Kong.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3(2), 55–73.
- Lee, C. C., & Chan, J. M. (1990). Government control of the press in Hong Kong. *Gazette*, 46, 125–139.
- Lee, C. C. et al. (2002). *Global media spectacle: News war over Hong Kong*.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Lee, F. L. F. (1999). *Activating informed participation: An assessment of media effects on voter turnout in the 1998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Unpublished master dissert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 Lee, F. L. F., & Chan, J. M. (2009). The organizational production of self-censorship in the Hong Kong media. *The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4, 112–133.
- Lee, F. L. F., & Chan, J. M. (2013). Activating movement support: Internet and public opinion toward social movements in Hong Kong.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8(1), 145–167.
- Lee, F. L. F. (2014). The impact of online user-generated satire on young people's political attitudes: Test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knowledge and discussion. *Telematics & Informatics*, 31(3), 397–409.
- Lee, P. S. N. (2003). Television, identity and civil society—The role of a non-controversial public space in Hong Kong. In Kitley, P. (ed.), *Television, regulation and civil society in Asia* (pp. 188–204). London: Curzon.
- Lee, P. S. N., & Chu, L. L. (1998). The inherent dependence on power: The Hong Kong press in political transition.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20(1), 59–77.
- Ma, E. K. W. (1999). *Culture, politics, and television in Hong Ko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McIntyre, B. T. (1995). Public perceptions of newspapers' political positions: A perceptual map of Hong Kong newspapers.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1), 126–135.
- McLeod, M. G., Kosicki, G. M., & McLeod, J. M. (2002). Resurvey the boundarie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effects. In Bryant, J., & Zillmann, D. (Eds.), *Media effects: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pp. 215–268). NJ: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 McNair, B. (1995).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McQuail, D. (2000). *McQuail'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4th ed.). London: Sage.

- Mitchell, R. E. (1969). How Hong Kong newspaper have responded to 15 years of rapid social change. *Asian Survey*, 9, 673–678.
- Mueller, C. (1973). *The politics of communic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immo, D., & Combs, J. E. (1990). *Mediated political realities* (2nd ed.). New York: Longman.
- Nimmo, D., & Sanders, K. R. (1984).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Inc.
- Nimmo, D., & Swanson, D. L. (1990). The field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Beyond the voter persuasion paradigm. In Swanson, D. L., & Nimmo, D. (Eds.), *New directions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 resource book* (pp. 7–47). London: Sage.
- Nip, J. Y. M., & To, Y. M. (1999). Television coverage: Objectivity and public service. In Kuan, H. C. et al. (Eds.), *Power transfer and electoral politics: The first legislative election i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pp. 205–212).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So, C. Y. K. (1982). *Dialectic of journalistic attitude: A study of Hong Kong press' treatment of government news*. Unpublished master dissert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 So, C. Y. K. (1987). The summit as war: How journalists use metaphors. *Journalism Quarterly*, 64, 623–626.
- So, C. Y. K. (1996). Pre-1997 Hong Kong press: Cut-throat competition and the changing journalistic paradigm. In Nyaw, M. K., & Lee, S. M. (eds.), *The Other Hong Kong Report 1996* (pp. 485–505).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So, C. Y. K. (1999). Dialectic of journalistic orientation: A study of the treatment of government news by the Hong Kong press. In So, C. Y. K., & Chan, J. M. (Eds.), *Press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Case studies from 1967 to 1997* (pp. 95–136).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for Asia-Pacific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So, C. Y. K., & Chan, J. M. (Eds.). (1999). *Press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Case studies from 1967–1997*.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So, C. Y. K., & Chan, J. M. (2007). Professionalism, politics and market force: Survey studies of Hong Kong journalists 1996–2006.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2), 148–158.
- Sum, N. L. (1995). More than a “war of words”: 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struggle for dominance during the recent “political reform” period in Hong Kong. *Economy and Society*, 24(1), 67–100.
- Wilkins, K. G., & Bates, B. J. (1995). Political distrust in Hong Kong: News media use and political beliefs regarding the 1997 transition.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2), 62–89.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36期(2016)

- Willnat, L. (1996). 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ian outspokenness in Hong Kong: Testing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hird-person effect and the spiral of sil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8(2), 187–212.
- Willnat, L., & Wilkins, K. (1997).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mass media impact on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The case of Hong Kong. In McIntyre, B. T. (Eds.), *Mass media in the Asia Pacific* (pp. 29–43). Clevedon, Philadelphia, Toronto, Sydney, Johannesburg: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 本文引用格式

徐來、黃煜 (2016)。〈香港政治傳播研究的軌跡與前景〉。《傳播與社會學刊》，第36期，頁133–162。